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

朱鸿博 江时学 蔡同昌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

朱鸿博 江时学 蔡同昌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 / 朱鸿博等主编.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309-05354-8

I. 国… II. 朱… III. 国际关系—研究—拉丁美洲
IV. D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3410 号

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

朱鸿博 江时学 蔡同昌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邬红伟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45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5354 - 8 / D · 32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交代这本书的由来,就要介绍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的历史和复兴,介绍该室近年举行的两次重要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以下简称拉美室),是国内较早成立的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它成立于1964年,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成立发展起来的,最初设立于我校历史系,全盛时候曾拥有近30名科研教学人员。2000年12月随着新一轮院系建设,拉美室进入了当时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院。

2003年底,我出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负责人,立即开始了振兴拉美室的工作。在我看来,拉美是我国外交工作发展的战略要地,大学的拉美研究要有强烈的促进国家利益的使命感。当时我们的情况是:(1)发展起步早,拉美室在国际问题研究院当时的七个研究部门中,是最早成立的。(2)现状不理想,尤其是研究队伍严重萎缩。但即使这样,复旦的拉美研究仍有薪火传承,在我国高校中仍有特色以及点滴优势。

2004年,恰逢拉美室建室40周年。我们决定通过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来予以庆祝。我们邀请了拉美室的退休教师和复旦有关院系的教授及领导、上海市内的有关科研院所、教学机构以及国内与拉美有关的教学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驻沪拉美国家总领事、拉美国家大学驻沪代表等50余人一同与会,回顾40年拉美室发展的风雨里程,共商未来复旦拉美研究发展的大计。

当时,考虑到中拉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胡锦涛主席将于2004年年底访问拉美四国,我们将研讨会主题定为“新视野下的拉丁美洲与中拉关系”。2004年11月26—27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10余篇论文。

这是近年来复旦大学拉美学术活动的复苏,是拉美室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和庆祝活动,也是拉美室近20余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学术讨论。适逢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上海的主流媒体如《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都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报道,扩大了拉美室在国内外的影响。

第二年(2005年),我们迎来了复旦百年校庆,我院拉美室与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又共同举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美国与拉美的合作与对抗”。我们把研究和交流的视线从中拉关系延伸到美拉关系,这个想法与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想法不谋而合,特别是得到江时学副所长的赞同,并取得拉美所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复旦拉美室承办了这次会议,会议于2005年6月27日至28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会议组织者邀请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江汉大学和我校等单位的2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并收到论文20余篇。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及其所属的拉丁美洲研究室共同合作的结果,也是拉美学界京沪和南北学者共同参与和交流的一次盛会。

这两次会议都举办得很成功,各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发言精彩,也提交了质量很高的论文。但会议的圆满召开,并不意味着

着我们工作的结束,将这两次会议的论文尽早结集出版是我们的心愿,也是与会众多专家学者的心愿。同时这也是对拉丁美洲研究室建室 40 周年和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最好纪念,是对关心和支持复旦拉美室发展的学界同仁的最好答谢。在复旦大学拉美室和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共同努力下,2007 年 4 月这本论文集终于要面世。

我在此代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室,对此书和第二次会议的合作方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为会议提供了场地和后勤支持,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沈丁立

2007 年 4 月 8 日

目 录

第一编 南北关系的新调整及美国与拉美的关系

1.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特点 苏振兴 (3)
2. 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与美拉
关系 徐世澄 (20)
3. 拉美对外关系中的两重性 江时学 (44)
4. 当代墨西哥移民问题与美墨两国政治经济 刘文龙 (66)
5. 略论冷战时期拉美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及其启示 陈才兴 (82)
6. 全球化时代南北关系的特点与发展中国家的
命运 袁东振 (97)
7. 从美国与墨西哥经济一体化看美拉关系 谢文泽 (112)
8. 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帮手”还是“凶手” 齐峰田 (126)
9. 查韦斯执政以来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 王 鹏 (141)
10.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拉美的高科技关系 宋 霞 (157)
11. “中心”与“边缘”的新博弈
——以美国与哥伦比亚关系为例 张家栋 (174)

第二编 南南合作的新发展及中国与拉美的关系

12. 冷战后拉美国家外交的多元化 张家哲 (193)
13. 拉美经济全面复苏和中国与拉美经贸关系
快速发展 卢国正 (206)

14. 美洲白银与早期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韩 琦 (247)
15. 论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 吴志华 (271)
16. 1910 年前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和中墨关系 董经胜 (285)
17. 中国与巴西关系简述 张宝宇 (305)
18. 中国与拉美关系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
蕴涵 吴洪英 (322)
19. 浅析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贸易 程 洪 (333)
20. 福克斯政府时期的中国与墨西哥关系 朱鸿博 (340)

第三编 拉美综合问题研究

21. 研究型综合大学中理应有拉美学一席之地 张森根 (357)
22. 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
——近 10 年来我国的拉美史研究 林被甸 (362)
23. 对当前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分析 杨志敏 (379)
24.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墨西哥经济 谌国庭 (388)
25. 墨西哥自由化进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与农业
危机 王翠文 (400)
26. 寻求大国地位的巴西 张维琪 (412)
27. 中产阶级理论——理解“拉美化”的一个
视角 王 珏 (418)

第一编

南北关系的新调整及 美国与拉美的关系

1.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特点

苏振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研究员)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全球化时代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究竟以哪个历史时点作为“全球化时代”开始的标志,人们显然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证。因此,我想首先声明一点:本文对美拉关系的讨论局限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30年。这个论述范围的选择主要是依据美拉关系本身发展的某些阶段性特点以及事态发展的连续性。我不想断定上述这30年是否都属于人们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但是,如果从美拉关系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观察,上述这个阶段双方的关系确实具有某些与以往不同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特点。

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关系。最近30年来,随着拉美地区危机频繁发生(80年代以债务危机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发展危机,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多次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特别是随着世界两极冷战格局结束和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后,美拉双方地位失衡的状况进一步加深,美拉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更加突出。

从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角度来观察,尽管30年间美国历届政府之间存在着差异,但美国在拉丁美洲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却是前后一致的。笔者试图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来概括全

球化背景下美国对拉美政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智囊人物福山认为,20世纪最后25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外,经济学范畴中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也在普及”,“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①。最近30年间,拉丁美洲是福山所鼓吹的这两种“福音”传播得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而美国则在其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美国“人权外交”与拉美民主化

拉美国家在其独立建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政治体制方面民主政权与独裁政权频繁交替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这种交替现象还曾先后形成几个明显的周期。可以说,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走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前进道路。这种现象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多种内部因素决定的,但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影响,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例,当时右翼军事政变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浪潮,席卷了几乎整个拉丁美洲。这股浪潮始于1962年阿根廷和秘鲁的军人政变。到1976年阿根廷军人推翻庇隆政府为止,整个拉丁美洲继续由民选的文人政府治理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这个时期拉美的独裁政权有两种类型,一类可称为“传统型”,以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政权、海地的杜瓦利埃政权、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权为代表,政治上独裁专制,

^①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代序”第4页。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无所作为;另一类即所谓“权威主义”型,政治上同样独裁专制,但积极致力于经济发展,其中巴西在军政府时期出现“经济奇迹”,智利在军政府时期启动了大规模的结构改革。

六七十年代拉美这股右翼军事政变浪潮的出现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出现偏差,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并进而导致激烈的政治动荡。二是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并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事态发展被美国视为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打开了一个缺口。在美国看来,拉美那些具有民主改革倾向的文人政府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右翼军人的铁腕统治才是防范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张的一道屏障。因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些年代里,美国不仅扮演了拉美国家右翼军事政变的策动者、独裁政权的保护者的角色,而且也不像今天这样起劲地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和高喊“人权高于主权”,相反,对拉美军政府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

从1978年起,拉美地区的政治风向又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一股军人独裁政权“还政于民”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于这一年将部分权力移交给文人总统,开了这次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先河。此后,其他拉美国家的军政府陆续通过多种方式交出政权。到1990年3月智利军政府交权为止,这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权力由军人向文人转移的阶段基本结束,拉丁美洲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片民主的大陆”。

亨廷顿曾引述李普塞的观点说:“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积极作用。”^①这个观点本身并不错,但用它来解释拉丁美洲的上述民主化浪潮似乎缺乏充分的说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序”第3—4页。

服力。在拉美发展史上,1950—1980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期,地区经济保持了前所未有的长达30年的持续增长。尽管当时广大社会阶层有着强烈的民主诉求,但政治民主化却没有什麼进展。当这个发展阶段已接近尾声,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行将爆发之际,却出现一次民主化浪潮。对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战后几十年间拉美民众的民主诉求遭到长期压制,特别是各国独裁政权残酷的镇压政策,拉美国普遍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反抗,其中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正在节节胜利。葡萄牙(1974年)、西班牙(1975年)独裁政权的倾覆和代议制民主的重现,对拉美地区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可以说,尽管到70年代中期,曾以自发的武装反抗一度震撼整个拉美地区的数十支城、乡游击队都遭到残酷镇压,日渐式微,但拉美地区如果不采取重大的变革举措,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依旧无法化解。

1977年上台执政的美国卡特政府强调“人权外交”。显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是适应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是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的,正如有的评论指出,美国“把人权用来发动一场新的冷战”。对于拉丁美洲,卡特把他的人权外交的目的说得非常明确:“我决心既支持较为独裁专制的盟国和朋友,又有力地在这类国家促进人权,我们引导它们改变镇压政策,就会扩大自由与民主,并将帮助它们消除爆发革命的原因,因为革命常常是从那些受迫害的人们中爆发出来的。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实现我们的目的,从而无需以一个同样具有压迫性质的左翼政权去替换一个极权的右翼政权。”^①也就是说,美国要在拉丁美洲采取主动,用“维护人权”和恢复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手段来化解这场政治危

① 《华尔街日报》社论,1980年1月18日。

机,防止这场危机演变成革命。可见,美国是从美苏争霸和“防止共产主义颠覆”的战略目标来对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加以定位的。80年代初里根入主白宫之后,尼加拉瓜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反帝、反独裁斗争进一步高涨,中美洲危机全面爆发。卡特所担心的危机演变成革命、极权的右翼政权被左翼政权“替换”的局面,在中美洲这个局部地区已经成为现实。因此,里根政府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其他拉美国家独裁政权的强大压力,敦促它们“还政于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把中美洲变成美苏争夺的战场,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低烈度战争”,并支持拉美国家发起的“中美洲和平进程”,造成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通过这种两手政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第一,苏联被迫从中美洲地区退出;第二,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恢复民主,游击队放下武器,参与政治生活;第三,在1990年尼加拉瓜大选中,美国全力支持以查莫罗夫人为首的竞选联盟,使桑地诺阵线在选票箱中丢失政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拉美地区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直延续至今,标志着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固然应当首先从拉美各国内部去分析引起这种政治变化的原因,但是,如果忽略了“美国因素”对这个进程的影响,就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二、从智利“试验”到“华盛顿共识”

最近30年间,拉美国家经济领域的突出变化就是由原来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促成这种体制转轨的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开始,既经历了一个改革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改革范式在拉美地区逐步推广的过程。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问世,标志着

政策体系已基本定型,主要包括贸易开放、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税制改革、劳工市场灵活化、社会保障体系局部私有化等。大体也是在1990年前后,这场改革由前期在拉美少数国家进行开始转入在整个拉美地区全面实施阶段。

由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1993年“9·11”军事政变,推翻了由智利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团结”政府,杀害了阿连德总统。美国情报机构参与和资助这场血腥军事政变的事实是有案可查的。1970年开始执政的“人民团结”政府在其基本纲领中提出了反帝、反垄断、反寡头的任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土地改革、外资企业国有化和征收国内私人企业等措施,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社会所有制领域”。智利这场激进的改革运动是二战后拉美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古巴革命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高潮,既引起国内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更为美国所不容。因此,在“9·11”政变后,智利军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残酷镇压左翼力量,而且在经济上大力展开对“人民团结”政府经济政策的批判,指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为军政府经济政策的右转制造舆论。这个背景决定了智利必然要转向新自由主义。从国际背景来看,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滞胀”局面的出现,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复兴。至于智利军政府在改革初期主要选择了现代货币主义,则与国内有一批弗里德曼的门生——“芝加哥弟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智利的事态发展来看,通过军人推翻阿连德政府来彻底改变智利的发展方向这样一个重大决策,美国是直接参与了的。在智利选择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或许并不明显,但是,美国主流学术界和思想界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弗里德曼曾亲临智利指导经济改革,并为他的学生们“感到自豪”。《华尔街日报》更是赞扬智利那些“能同时降低通货膨

胀、关税和失业的经济学家将在华盛顿受到欢迎”^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出台,新自由主义成了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思想,美国政府也开始在国际上扮演积极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角色。在拉美地区,1982 年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众多的拉美国家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的深渊,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战后几十年间作为该地区主流经济思想的拉美结构主义则因这场危机的形成和爆发而逐渐失去影响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以及拉美当地的自由派报刊掀起了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强大舆论宣传,强烈抨击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诱导拉美国家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之路。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组成了债权人俱乐部,相互协调立场和对策,拒绝拉美国家提出的“以发展促还债”的主张,停止提供新贷款,要求这些国家实行“衰退性调整”,以保证按期偿还债务利息。其结果是,拉美地区经济连年衰退。

1985 年 9 月,以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姓氏命名的“贝克计划”作为西方第二个债务战略正式出台。“贝克计划”与西方第一个债务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接受债务国“以发展促还债”的建议,同意由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向发展中的重债务国(大多数是拉美国家)提供新的贷款支持,以推动其经济的适度增长,从而避免债务国完全丧失偿还债务的能力。但是,债务国要获得新的贷款支持,必须按西方国家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因此,“贝克计划”明确提出,债务国必须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以实现“削减政府开支,紧缩财政,开放经

① John Williamson, “Revision del consenso de Washington”, Louis Emmerij y Jose Nuñez del Arco (comililadores): *El desarrollo economico y social en los umbrales del siglo XXI*, p. 51. BID, Washington, D. C. 1998, p. 51. Proyecto de las Americas, p. 51.